



两地诗忆

□李啸洋

诗意的浙江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今年夏天，终于来到杭州了。

这次杭州行，我们去了杭州西湖、杭州国家版本馆、浙江文学馆、浙江非遗馆、海宁徐志摩故居、海宁非物质文化遗产碑石灯彩馆、良渚博物院等地，40摄氏度的热天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苏轼在《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中写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果然到了西湖，便是清爽透亮。我们在西湖游船，到了湖中便可看到开湖的岛，远远便能望见雷峰塔。只不过因为太热、人太多了，泛游西湖的乐趣便少了一些。西湖到处都是水，水中的亭子，水中的荷花，水中的鱼，水边的树，水这里是最大的环境要素——李白在《与从侄杭州刺史良游天竺寺》中写道：“弄水穷清幽。”

晚上时，我和十来个年轻人一起去纯真年代书店，在书店里吹了一会儿凉风，顺便听了一名诗人讲的悲伤故事。因为在夜晚，外面很热，屋里倒很凉快，发生在2008年的悲伤故事多少显得有些恍惚。想一想，今年是2024年了，已经过去十六年了。时间毫不留情。

爬蛤蟆峰的时候，大概晚上十一点多了，上山的人还是不少。关于杭州的诗太多了，白居易《杭州春望》：“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孟浩然《与杭州薛司户登樟亭楼作》：“水楼一登眺，半出青林高。”白居易和孟浩然的诗歌太精准了，他们早就掌握了杭州风景的别致之处。

这样的夜晚看不到地平线，当然也无法想象西北的广袤和凉爽。蛤蟆峰在石头缝里，每走一步都是汗水。上山前，我们看到了夜灯保卫的保俶塔，明晃晃的古意盎然。到了蛤蟆峰，看到了开湖的西湖，夜风徐来之际，带来丝丝凉意。

第二个令人难忘的地方是杭州国家版本馆，首届国际青春诗会是在这里开幕的。杭州国家版本馆也被称为文润阁、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是设计师王澐在废弃的矿坑的基础上设计的，江南风格突出，宋代元素明显。版本馆有三处令人印象深刻。第一处是青绿色的瓷砖，颜色取自龙泉青瓷里的“梅子青”，这种颜色做成屏风，和自然界的竹子相映生辉。第二处是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范宽的这幅画风格雄健、笔力冷峻，画面主体巨峰矗立，垂直峻峭。版本馆的设计思路是“南园北馆”，其中山峰在夜色中变得无比突出，一下就想到了这张画，夜灯将山景照亮，恍若范宽的水画穿越到现代。第三处，便是夜景中的建筑了。参加完开幕仪式出来，从外面看建筑里灯火之光仿佛是从古代溢出来的，古意盎然。可惜的是，时间原因未能进去一观。夜晚，让白天拥挤而嘈杂的杭州变得像古代一样安静，山水方变得可以聆听、对话。

浙江文学馆是此次出行中让人崇敬的地方。馆中参观，可看到鲁迅、茅盾、金庸等大师的作品。文学馆的走廊和展厅设计典雅、肃穆、低调、简约，一下让人感受到文学殿堂的气息。读文学大师的作品，会让人沉浸其中。到了文学馆中，便是另一种心情：崇敬、景仰。作家的一生浓缩在展板上，辉煌的作品永远熠熠生辉。这种景仰让人心生羡慕，激发了为文学而奋斗、献身的理想。导游说了很多熟练的台词、作家趣事，这些显得琐碎、平常。一切写作的苦累、人间的孤独、疾病、痛楚、遗憾、悲苦，都在伟大的作品面前得到宽慰。文学改造灵魂，首先是改造了作家自己的灵魂，文学最终让精神得以升华，这是文学中最轻盈、最美妙的功能。

随后，我们到了海宁徐志摩故居，抵达时正值下午炎热之际。从展出的作品和照片来看，徐志摩显得很瘦削，这也解释了诗歌中的轻柔风格，像《再别康桥》中所写的那般：“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展馆里挂了巨幅的徐志摩、林徽因和泰戈尔1924年的合照，现场参观的几位印度诗人对着照片纷纷拍照，中国和印度文学界早在1924年便搭建起了桥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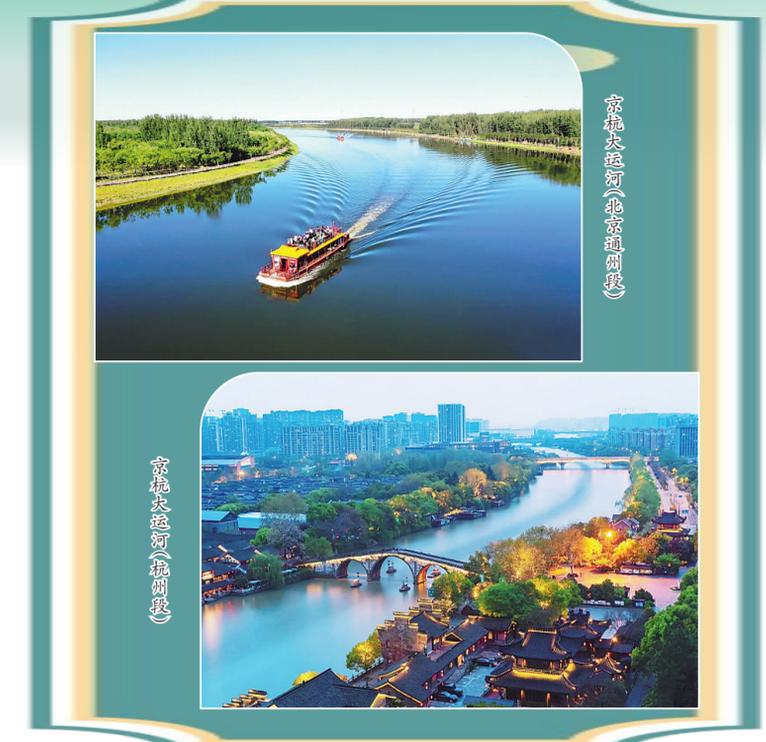
北京的开阔与雄宏

在北京，我们乘大巴车去了故宫和长城。这两处建筑，都显得无比雄宏，与西湖的精致相比，北京的旅游景点显得空旷、开阔。郁达夫写过《故都的秋》，此处也拟仿一下郁达夫的文风，以书南北风景之别：

江南，草木窜得快，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时而多雨少风。江南的雨没有前奏。雨来时便同水管里挤出来似的，隔一会儿便唰唰齐下。南方的夏没有北方这般稀松，一个人到了大同或者包头的清晨，一个人走在呼市或者西安的傍晚，早晚的凉爽让人怀乡。这时，秋风悄悄四起，乡愁会泛起惆怅。南方的夏，被热压抑着。到了冬日，又是苦雨凄风，乡愁的情绪被弄得总是悲惨。

故宫的雨，雍和宫的香火，八达岭的凉雾，慕田峪长城的凉雾，天坛的早菊花，颐和园的明月，老胡同里的冰沙——北京的夏天色彩浓烈，回音响彻，意味无穷。南方比起北国的夏，正如葡萄之与西瓜，米酒之与烈白，鲈鱼之与螃蟹，米粥之与馒头。北国的夏，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烈。

北京夏天最开阔的去处，要属故宫和长城了。电视剧《雍正王朝》《康熙王朝》热播的时候，最期待来故宫看雪或者看雨。雨和雪，赋予了故宫独特的韵味。在故宫听雨，有一种抑扬顿挫的历史感。赏雪，似乎又回到古代的审美。长城观景和园林有相似的地方，也是一步一景。不过，长城的景是远景，长城像一条蜿蜒的长龙，在四处游动。人群像是举了火把一般，缓慢在长城游动。人们都说：“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好汉是怎么来的呢？典故和传奇其实早已写明了。中国古代的长城曾经有各种不同的称呼。根据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的研究，春秋战国到明代，长城也被称为甌、长甌、城甌、墙甌。甌的意思，是壕沟之意。此外，长城也在一段时间里被称为“塞”，“塞”有两意，一个意思是关口要隘，另一个意思则



京杭大运河(北京通州段)

京杭大运河(杭州段)

表示长城。《战国策》中记载：“长城、钜防，足以为塞。”《史记》中就有长城亭障的说法。壕堑、界壕是长城建筑的一种形式，界壕则是金代长城的专用词；边墙、边垣，主要是明朝的称谓。中国古代，多将中原各地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地域称为“边地”，明代则将在这一地域修筑的长城称为“边墙”或“边垣”。长城建筑的空间原则，是依靠地形，用制险塞。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长城上的“女墙”。女儿墙又叫“睥睨”，指城墙上的小墙，建筑高度不到一米，比垛口低，功能上相当于护栏。所以从长度来看，“雄关漫道”是长城独有的风景，静下来在长城上驻足，女儿墙又是另一种风景。

长城本是区隔的边界，如今首届国际青春诗会在长城举办，长城成了友谊和沟通的象征。中国诗人周庆荣曾写过一首散文诗《长城》：“一块砖和又一块砖。我尊重这些被选择的砖石。它们一动不动，寂寞地走进遗忘或者曾经聆听喧闹的沙场搏击。它们以长城的名义，在漫长的岁月里，守望并且热爱。”千百年来，诗歌用文字垒成的砖石，建造了心灵坚固的桥梁。本次诗会连接起不同肤色的心灵，铸起跨国友谊的万里长城。

诗歌与情感

这次旅行中最令人难忘的还是诗歌朗诵会。朗诵会在浙江海宁、长城脚下各自举办了一场。来自各个国家的诗人，用自身母语朗诵了诗歌。埃塞俄比亚的诗人朗诵时，像一位和天地感应的巫师；伊朗诗人朗诵时，像是与先知在对话；巴西诗人朗诵时，能明显感受到他们的热情奔放——某种意义上，正是母语塑造了诗人的灵魂面相。

印度诗歌中，有一首诗歌让我难忘。阿迪蒂亚·舒克拉的诗歌《我的村里一座坟墓也没有》中，有几节是这么写的：“我的村里，一座坟墓也没有，但却有，很多很多的空地，/杂草/砖瓦石块，水泥，还有干活的人。人总是要死的，/而我的村里，有很多花园。我有自己的花园，有自己的花草和绿植。”这首诗歌是在海宁朗诵会上听到的，听的时候我已经被吸

引了。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表达向死而生的时候经常会讲勇气，会讲英雄气节，大义凛然，正视死亡。这首诗将死亡升华了，诗人也是用死亡的终极追问来观察人生的，笔意开阔，颇得泰戈尔“死如秋叶之静美”的真传。另外一首感动人的诗歌，是阿联酋的诗人谢哈·穆泰里写的，诗的名字叫作《出生》：“我是一张面饼，生在穷人的唇边。我是一把鸟德琴，却无人弹唱。我出生在穷人的早晨，我出生在孩子的傍晚，在他们的日子里，我时刻都在出生。我出生了，且仍在出生，我依然独自是所有的问题。”这首诗歌令人动容，诗歌写出了女性贫困者的悲苦命运。

还有一首诗歌是关于年龄和灵感的，印度诗人尼基莱什·米什拉写的《时隔多年又写了一行》：“当我看了一眼，/我大笑不止。/因为，感觉就像是/我从某个其他诗人的/想象中/摘取了这一行。”这首诗歌写得如此轻松，写出了每个写作者曾经的困惑。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写作最满意的时候，当然也有沮丧的时候，这首诗歌写的正是状态的反差，写的正是那些沮丧时刻作家对自己的怀疑。

最后一位印象深刻的诗人，是南非诗人沃纳尼·比拉。他的两首诗写得慷慨激昂，都是关于非洲本土传统和殖民主义的思考。一首诗是《不要玩弄你的心》，另一首是《舞》，最初写的是非洲舞蹈的狂欢：“你们/脸上涂满颜料的舞者——头埋在羞耻中/让燃烧的香火周围/那些吧嗒的邦戈鼓安静/脱掉你们背上的豹皮、角、草和芦苇/扔掉你们的豪猪刺帽、面具、玛瑙壳/手镯、铃铛和珠子/用裹身布缠绕你们丰满的胸部和腰臀。”可是，读到后面我们便笑不起来了，原因是这些舞蹈并不是非洲土著本意的表达，跳舞的目的是“为一美元、一英镑、一片面包和一份汤”。快到了收尾的时候，诗人写道：“你们把遗产出卖得太便宜/这无意义的民族手鼓舞搞得我筋疲力尽我疲倦/亲爱的非洲孩子/你们的自由意味着什么？”这首诗歌，读起来很震撼，一个简单的舞蹈，诗人能想到宏大而伤痛的历史，诗中压缩进去很多内容，思考深刻。这么多外国诗人的创作打开了我的创作视野。非常感谢国际青春诗会。

作家故事

名片

□程丹梅

时期认识的。或许因为她的身材跟我一样也是女性里偏高的，所以让我很有认同感，马上就聊了开来。洪女士很知性，让我不得不佩服施光南找夫人真的有点品位。我这样跟洪如丁说了，她悲伤的脸上露出了些许笑容，我们也就一下子拉近了距离。那天，还有施光南的好友，同为作曲家的王立平以及词作家晓光等名家在座。似乎当时有人建议由王立平来将施光南未完成的作品给续写下去，我不知王立平最终答应了没有，我的几位同行当时在场，大家议论说不太合适，虽然两位作曲家彼此了解，也彼此尊重，但是他们的风格还是不相同的。那时王立平刚刚呕心沥血地为电视剧连续剧《红楼梦》谱写了曲子，赢得了很多赞誉，我们见他时总要对他说上几句《枉凝眉》或者《葬花吟》，以表示我们的喜爱或者绝对的认可。后来我和作曲家也成了无话不谈的老朋友。

我清楚地记得洪如丁在对她叙述她与施光南的往事里，所充满的怀念之情。她说家里钢琴上总摆着勿忘我花，因为施光南喜欢，说它不仅生命力强，而且也美丽，洪如丁就建议夫君为它作首曲子。果然，施光南真的为它写了一首歌。后来洪女士被派往国外工作，临走前，施光南让妻子随身带了两首歌，一首是《多情的土地》，另一

首就是《勿忘我》……因为洪如丁的这些深沉的叙述很让我感动，也为我的采访增添了不少带有感情色彩的描绘，使我写的那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特写《永不消逝的旋律》获了当年的新闻奖。

一张纸片从盒子里落了下来，我拾起，大吃了一惊，道：“张君秋，电话号码……”这是写在老式的红色横格信纸上的毛笔字。我立即想起了张先生和蔼可亲的微笑，我回忆着，那一定是在京剧表演艺术家王蓉蓉向老先生拜师时，我要采访他而得到的。那时候，王蓉蓉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是崭露头角的新星，她主演的张派名剧《状元媒》《诗文会》等都很成功。我最欣赏蓉蓉的嗓音，总觉得她若去唱歌剧也一定会成功的。因为成了好朋友，蓉蓉就告诉我她拜张君秋老先生的一些故事，当然也允许我偶尔为了多了解细节去看她化妆。那个过程真让我大开眼界，那漫长的、细致的、一丝不苟的着色、扑粉、勒头、描眉画眼，让人目不暇接，也让人惊叹不已；而道具间里的那些凤冠霞帔、顶戴花翎等也同样令我眼花缭

乱。不得不说，这些都对我算是一种有效的浸染。很可惜的是，我虽然多次与大师张君秋在不同场合有过交谈，但还是因各种原因没能去成他家采访他，现在想来仍是一个遗憾。

说来有趣，当年与我年龄相仿的各界年轻新锐们后来都成了栋梁人物，可我的记忆里却还是当年接触他们时的模样。比如帅气的版画家方振宁，如今早已是策展的大牌人物，而通过他认识的青年艺术理论家陈履生，后者曾为我编辑的版面写过文章，后来还成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现在不仅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博物馆，而且依然活跃在美术界。当然还有画家纪连彬，认识他时他刚从西藏写生回来，一身豪爽，后来成

了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最有意思的，还是找到了戏剧家过士行一事。其实老过曾是我的新闻界同行，他在《北京晚报》当记者时，我们三天两头会在首都的各种文艺场所碰到。用“碰到”一词说明我有些不甘，因为记者虽然喜欢和同行见面，但也总希望自己所写的是独家报道。不过，我和老过相处得很好，为一些活动互通通风报信。他挺有才，说话好玩儿，知道老北京的故事甚多。特别是当我发现那个在《北京晚报》上写《聊斋》专栏的“山海客”是年轻的他时，我大吃一惊，因为他的老到、幽默让我一直以为那是位跟翁偶虹老先生那般老的先生。我之所以提过士行，不是因为他写了《鱼人》《鸟人》和《棋人》等很轰动的话剧，而是因为我长期跟他失联了，结果就在父母家那次帮父亲整理名片时发现了他曾经给我的名片，而且他飞龙凤舞的手机号也在上面。我拨打了，还真就找到了他！这让我很是欣喜。老过的名片上跟我一样，只印了报社和姓名，很朴素，让人一目了然，所以找到他就很容易了。

当然，我和父亲整理来整理去，最后还是留下了一大半名片。其中不少属于我的，我就又带回德国汉堡的家里了。它们就像是一个个链接，后来我从中真的又找到了几位往日好友。

我很喜欢古罗马哲学家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的那句经典的“记忆是万物的宝库和守护者”，我也对奥斯卡·沃尔德的“记忆是我们随身携带的日记”深有同感，但是著名的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的话更直击我的心扉，他说：“如果你要读懂未来，那么你就必须翻阅过去……”对我来说，名片承载了一小段历史，我虽不会去无休止地整理它们，但我相信它们会偶尔给我一些提示，或许也将给我一些预示……

不知现今是否还有人看重名片，如当年那样，把整个人所有得到过的头衔儿都码在那几厘米长宽的硬纸片上？好像它已经过时了，落伍了吧？！

父亲程树榛还在世的时候，有一天夕阳西下，我在北京家里那被晒得暖融融的窗帘旁边帮助父亲整理书房。我发现写字台抽屉里的几十盒名片，不知该怎么处理，放置何处。请示父亲，他也不知。有很多连父亲自己都奇怪的名字，他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特别是与他毫不相关的单位、职业或者地址，似乎猜得出来是某次会议上交换的结果，我想多半也是出于礼貌。这让我俩都觉得有趣。不是吗？人们早就到了一个手机扫码就能解决问题的时代了，即便是极其正式的场合，名片也几乎被淘汰了。

我和父亲猜想名片上除了名字不变外，其他的诸如职业、地址、电话等全都是变了，或许是巨变了，所以很多都已是无用的了。我就做过这样蠢特的事：曾经和一个多年不见的熟人再聚，不知人家已经升迁多年了，却仍旧直呼姓名，结果惹得人家冲我翻了好长时间的白眼儿；还有一次，我拿着几年前名片找人，竟然被电话另一头呵斥了一顿。有了这样的经验，我劝父亲想个法子处理那些他早已不熟悉也不再需要的硬纸片，这也不能算是对送名片的人的不敬。最终我有了一个周全的办法：让父亲将他认识的、不熟悉的、没有印象的或者重复了的交给我，为了隐私与安全起见，我将名片剪碎，不留完整的地址、电话以及名字等。就这样，那天，我和父亲并列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如流水线那般，他一张一张地看，我一张一张地剪。这个工作看起来不轻松，却很有意思。

我们都发现了一个发现：名片竟然已经成了

文物！看名片，会发现很多人当年的行踪，让人产生很多回忆，想起很多有趣、可笑、温馨甚至是悲伤的故事。比如父亲看到了某个出版社的老编辑的名片，就很激动地忆起当年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奇怪的是，混在父亲的名片大军里，居然还有我若干年前的十几盒名片。除了为工作而印制的两盒《光明日报》文艺部记者编辑的工作名片外，我还发现了很多久违的名字。我饶有兴趣地一张张地看，看到了指挥家李德伦、话剧艺术家于是之、油画家靳尚谊、作曲家王立平、词作家乔羽、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家王蓉蓉、歌唱家胡松华、电影艺术家于洋、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围棋职业九段陈祖德、音乐家施光南的夫人洪如丁等，还有不少已经记不得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认识的了。我想，这些著名人士也同样早已不记得当年那个年轻的记者了。

但是对于有些人，我还能记起当时的情形。比如于是之，他允许我在北京人艺院长室里旁听他和导演们讨论一个戏的计划。比如某个仲夏在李德伦家，他一边摇着芭蕉扇，一边讲述着早年出国学习指挥的故事。比如上海大剧院院长黎中城，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去上海采访时认识的，他给我介绍了不少上海剧院是怎样关注创作、重新赢得观众的事例。那次的上海之行让我有机会见到了散文家余秋雨和著名女导演黄蜀芹，并和他们面对面地交谈了，回来后我就写出了《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报道《改革潮推动文化潮》，这个占了一个半版篇幅的文章居然还在第二天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里被播报了，为此我也风光了好一阵子。

洪如丁女士呢，是在施光南告别演唱会筹备

首就是《勿忘我》……因为洪如丁的这些深沉的叙述很让我感动，也为我的采访增添了不少带有感情色彩的描绘，使我写的那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特写《永不消逝的旋律》获了当年的新闻奖。

一张纸片从盒子里落了下来，我拾起，大吃了一惊，道：“张君秋，电话号码……”这是写在老式的红色横格信纸上的毛笔字。我立即想起了张先生和蔼可亲的微笑，我回忆着，那一定是在京剧表演艺术家王蓉蓉向老先生拜师时，我要采访他而得到的。那时候，王蓉蓉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是崭露头角的新星，她主演的张派名剧《状元媒》《诗文会》等都很成功。我最欣赏蓉蓉的嗓音，总觉得她若去唱歌剧也一定会成功的。因为成了好朋友，蓉蓉就告诉我她拜张君秋老先生的一些故事，当然也允许我偶尔为了多了解细节去看她化妆。那个过程真让我大开眼界，那漫长的、细致的、一丝不苟的着色、扑粉、勒头、描眉画眼，让人目不暇接，也让人惊叹不已；而道具间里的那些凤冠霞帔、顶戴花翎等也同样令我眼花缭

乱。不得不说，这些都对我算是一种有效的浸染。很可惜的是，我虽然多次与大师张君秋在不同场合有过交谈，但还是因各种原因没能去成他家采访他，现在想来仍是一个遗憾。

说来有趣，当年与我年龄相仿的各界年轻新锐们后来都成了栋梁人物，可我的记忆里却还是当年接触他们时的模样。比如帅气的版画家方振宁，如今早已是策展的大牌人物，而通过他认识的青年艺术理论家陈履生，后者曾为我编辑的版面写过文章，后来还成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现在不仅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博物馆，而且依然活跃在美术界。当然还有画家纪连彬，认识他时他刚从西藏写生回来，一身豪爽，后来成

京杭笔记

□年薇漾

1 深夜的西湖暑气蒸腾，我的母语正隐隐发烫。从一场家宴离席，来赴诗友之约，已是晚间九点半。在北山路边的一间小书店里，十余人喝着小酒，或品茶寒暄，这时不知是谁提议要夜登宝石山，据说那儿有个地方能俯瞰西湖乃至整个杭州城，众人便欣然应允。

不多时来到保俶塔下，再往前，道路越逼仄。穿行在低矮陡峭的岩石间，四面树影层叠，幽暗难辨，只有手机自带的光源在随风摇曳。待拨开乱石，终于有依稀人声，正曝在峰顶的月光之下。极目四望，则夜色温良，满城山水一览无余。

记不清是第几次来杭州了，而这样的体验前所未有，由此联想起诗如险境，一寸险，一寸难。在词句中的探索并不见得比在自然间的问道容易，大多时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声音必泯然于众；有时剑走偏锋，独辟蹊径，却又可能钻进死路，耗神耗时亦需折返重来——在“众”与“独”之间的警醒，“通”与“绝”之间的敏锐，要靠无数次的练习去实现。

2 望日的月光哄睡了西湖，午夜时分，发生在同龄人间的聚会和朗诵都相继告一段落，接回大家的是浓重的睡意。有两个夜晚，躺在酒店宽大的床上，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后来索性穿衣出门，扫一辆停放在路旁的共享单车，加入夜骑的人群。

沿着三台山路往北再西折，穿过漫长的五老峰隧道，迎接你的是满觉陇路艰难的坡段。为什么执意要上坡？那里有一座一处烟霞洞石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寻访国保十余年，靠的正是写诗时的毅力与执着。每到一座新的城市，总有这样的感觉：那些散落天地间的古迹，仿佛都在向你发出召唤，它们默默忍受着的等待，也只是为了与你达成相会的一瞬。

道阻且长，有几处陡坡令人筋疲力尽，只好下来推车，这时若有素昧平生的夜骑者路过，都会侧身鼓励打气。就这样在陌生人的擦肩和鼓舞下，一路摸到目的地，完成了打卡。许多年后，也许一段旅途与其他千万程并无二样，但属于一座城市的温情却会予人隽永的回味。

3 中外嘉宾在同一艘船上游西湖，坐在对面的是南非诗人伊诺克·施申格。初次见面，非洲人展现了天生的热情，因此在短短几天的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包括在内的许多外国诗人各具本国民族特色的穿着，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另一位交流较多的外国诗人是来自印度的高塔姆·维格达。早在诗会开始前，我就已对他诗句中的“我的斗争和蝉一样古老”过目不忘。他自称是一位种族主义反抗者，其创作也大多围绕着这样的身份认同展开。

在许多次主持中国诗歌网每日好诗的线上直播中，我们也曾讨论过这样的问题，即一位诗人在处理诗歌题材时的自我认知。在我看来，很多人在写作前，对自己的体认往往是模糊或没有的，这样写作的弊端就是徒有词句而无真情；若是纵观他的所有作品，其风格和志趣也无法统一，难以令人信服，甚至可以归为无效写作。只有在创作前，怀揣着强烈的自我身份认知，一位诗人才能在笔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诗意景观，同时又与其他人有所区分，这样的写作也才有走向经典的可能。

4 有两个午后，分别与肖水、侯磊兄去看大运河。巧合的是，杭州的拱宸桥是大运河的南端，而北京通州则是大运河的北起点。从杭州到北京，不仅是诗人和诗意的南北迁徙，更是一项伟大遗产在眼底奔走数千年的绝妙隐喻。

有时脚步对大地的丈量，相较于书本，更能激起我们对家国情怀的共鸣。在广袤的六合八荒和历史场域间，无论得意者的舒缓或是失败者的喟叹，大英雄的功业还是小人物的生存，都能在古迹中找到蛛丝马迹。人生草草不过百年，代代相承的是他们关乎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的苦苦冥思与追寻。